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1.007

“迷之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下迷群现象解读

卜荣华, 吴洁

(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明星为代表的偶像对青少年粉丝群体—迷群—愈加呈现出家庭和学校教育所望尘莫及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借鉴迷群相关特性有助于提高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发现迷群认同主要具有如下特征:理想自我的投射、释放焦虑的安全阀及满足归属感的避风港等。迷群还具有两种积极的社会效应:想象共同体和公益孵化器。同时迷群也暴露出如下问题:网络暴力蔓延、侵权违法案件频出;极端行为凸显、扰乱公共秩序;资本操控、诱导消费。为减少负面影响、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可采取如下措施:培养正确价值观、提高自身素养;加强关爱、增加线下生活吸引力;强化资本监管、处置不法行为。

关键词:迷群;青少年;认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1-0041-07

The Influence on Fan Group: Interpretation of Fan Group Phenomenon in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 Ronghua, WU Jie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Anhui 24300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dols represented by stars have a far greater influence on young fans – fan group – than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could have. Therefore, learning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fan group is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youth education. We find that fan group identification has the following core characteristics: projection of an ideal self, a safety valve to release anxiety, a haven to satisfy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o on. Fan group also has two positive social effects: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incubator for public welfare. At the same time, fan group has also expose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spreading of cyber violence and frequent cases of infringement and illegality; more occurrences of extremist behavior and interruptions of public order; manipulations by capital and induced fans consumption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youth,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guide youth to cultivate correct values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ies; to give more care to youth and increase the attractions of offline life;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ver capital and punish illegal acts.

Keywords: fan group; youth; identifi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很多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对偶像人物的迷恋和追崇,这也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青少年的迷恋对象往往有着不同特点,如上世纪的雷锋、张海迪和女排姑娘都曾经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程的不断加速,当前青少年迷恋对象更多转向了影视和体育明星,同时由于新媒体的广泛使用,

粉丝们也从过去单打独斗、各自追星的随机“原子”状态转变为组织有序的团体作战——即所谓“迷群”。作为“粉丝”与“偶像”所构成的有机结合体——迷群——有其自身独特之处,这种群体往往热衷于某一事物,以此为纽带并在一定范围内自发形成有效互动关系。不论是对于社会名流如明星等的迷恋还是对影视作品、某种现象如 UFO 等的入

收稿日期:2022-08-3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迷群现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借鉴价值研究(20YJC710001);安徽工业大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迷群现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借鉴价值研究(2020xkcsz115)。

作者简介:卜荣华(1981—),女,安徽舒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迷,现代网络技术使人们得以最低成本实现共同爱好者的聚集,并实时分享各自资料和感悟,这些技术手段的使用又进一步加速了粉丝对迷群对象的认同。

从近年来诸多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不论是影视明星还是其他领域的社会名人,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粉丝赋予他们巨大影响力。明星代言的商品以及各种演唱会门票等虽然价格不菲但是依然广受欢迎便是切实有力的证明。这种巨大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级媒体,更是学校和家庭教育所望尘莫及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18日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指出,必须“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尽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如对理论内容持续深入研究和探讨、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各类实践活动层出不穷,但是客观而言考虑到投入成本,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程度不够。迷群之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与粉丝对明星的高度认同存在强关联,因此借鉴迷群的相关特性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有着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

一、迷群认同的核心特征

认同从个体意义上是指人们对更高地位或更高成就者的认可,从而消除个体在现实中因无法成功或满足时所产生的挫折感或焦虑感等。此外认同对象也可能是一个组织如某种协会;或者某种理论、作品,如因为喜爱某个影视作品而自发形成的迷群等等。对迷群的诸多研究表明粉丝对偶像、作品或现象等的认同是其核心因素,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粉丝群体认同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一)实现理想自我的投射

投射是指个体依据其需求或情绪等的主观指向,将自身存在的心理行为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的心理机制,即认为他人也会具有这些特征^[1]。现实生活中多数人生都是不完美的,总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憾。当个体不能实现自身理想时,偶像的完美或者某方面出色表现正好可以弥补个体自身不足。偶像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粉丝心中某种潜在欲望,个体可能会幻想某个迷人偶像是自己的理想伴侣或者是想象中的自己。

岳晓东^[2]认为对偶像人物的认同有助于青少年

确认自我价值、顺利度过青春期的迷茫状态,并且对偶像的认同和依恋也可以补偿由于脱离父母而造成的情感真空。总之偶像可以给青少年树立生活榜样、赋予粉丝巨大精神力量,因此产生无穷幻想和生活的勇气、支撑其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此外,通过崇拜某个歌星、影星或者体育明星可以使粉丝的自信心、自我概念以及人际交往等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进而促进青少年人格成长和自我完善。偶像既是粉丝情感投射的对象,也是他们获得情感慰藉和补偿的有效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和崇拜本质上是通过认同其成功事业、迷人气质、外表或者人格魅力从而获取个人成长养分,如很多崇拜美国篮球明星科比·比恩·布莱恩特的粉丝纷纷表示从偶像身上学习了勇气、毅力等等,这些良好品质也促进了他们个人学业或者事业的成长。

(二)释放焦虑的安全阀

当下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存在,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高度焦虑和不确定性。社会对人才要求越来越高,人们都在奋力拼搏,唯恐被时代所淘汰。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各种无休止加班、“996”等使得自嘲“社畜”的职场人士倍感焦虑和疲惫;一、二线大城市的高房价让青年人望房兴叹,即便买房也是背负巨额贷款、提前透支未来数十年的幸福生活。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3],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是28.67岁,而2010年这个数据则是24.89岁^[4]。这些数据是民众焦虑情绪的直观体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也被焦虑笼罩,比如渴望通过短期培训等获得荣誉和证书的成才成功焦虑、出于虚荣攀比的消费焦虑、自认为“颜值不够”而滋生的化妆整容焦虑等,在当前大学校园中都具有一定普遍性。

温尼科特认为在个体感受到的外部客观世界和内部心理世界之外,还存在第三空间即过渡空间,如同孩子的游戏空间或成人的文化空间,人们借助这个空间建立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5]。过渡空间的首要作用是应对焦虑和释放压力,或者得到某种安慰以维护自身心灵平和。显然迷群就是一种典型过渡空间的存在,对青少年群体而言不论他们是在学校求学还是初入职场,都无法对这种社会中弥漫的焦虑感熟视无睹或置身事外,从某种

意义而言,迷群就是他们释放焦虑和应对压力的减压舱或安全阀。通过欣赏偶像或追逐兴趣,可以得到精神满足、在喧哗都市中寻得一丝内心安宁,从而达到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

(三)满足归属感的避风港

伴随着中国经济及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新生代们,在享受着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体验着精神生活的空虚。城市儿童穿梭于数个补习班整日学习各种“兴趣”,而对于缺乏父母陪伴的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精神生活更是贫瘠得近乎一无所有。不论他们自身是否能够意识到,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归属感的缺乏都会以各种形式在成长过程中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人际交往和群体归属感是人们的重要需求。现实中人们往往身兼多重角色,涉及繁杂的人际交往,但是这些交往更多是出于工作或家庭需求的缘故。众所周知中国人为了维护人际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唯恐顾虑不周而无意中得罪其中某位。换言之,人们从这些交往中收获的满意感、幸福感非常有限。除去和少数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在其他交往中人们更多的体验或许是疲于应对的无力感和厌烦感。对于部分群体尤其是青少年而言,他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以更加有意义的方式生活,但是在家庭、学校或工作单位等现有社会空间中难以实现愿望,也缺乏足够的空间展现自身。

滕尼斯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传统上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团组织模式必然逐渐走向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以“趣缘”关系为重要聚合路径的现代社区兴起^[6]。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飞跃发展更是加速了这种进程。迷群就是一种典型的“趣缘”群体,由于存在共同爱好粉丝彼此间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借助于新媒体技术他们可以即时分享偶像资料和彼此感悟,而又不必体验真实人际交往的各种烦琐。群体成员间可以止于精神层面的交流,从更深层次满足人们的交往和归属需求。

二、迷群的积极效应

在疫情公益捐赠活动(即下文“666联盟”事件)、饭圈女孩出征事件中都可充分窥见^①等事件中,饭圈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网络技术加持下饭圈已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发展出现代组织架构的基本职能,具备大规模组织动员能力。某种意义上饭圈承担了共同体职能,助推青少年顺利实现从纯粹个体到社会一员的社会化转变。

(一)想象共同体

00后和9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见证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同时在市场逻辑下他们也承受了如高房价以及资产代际传承等导致的财富分化与社会撕裂。物质生活的富裕和互联网普及塑造了他们鲜明的个体化特征,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也滋生了底层感和无望感,屁民、丧、佛系、躺平等都是对这些感受的直接回应^[7]。

不同于生活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父辈和祖辈,工作单位或农村公社取代宗族构成经济和政治联结的共同体;随着市场竞争逻辑全面渗透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除了家庭这种最核心的共同体外,青年唯有依靠自身力量,残酷的竞争环境塑造了显著的代际特征——个体化,其后果之一便是他们往往倾向于淡化、漠视甚至无视社会中各种共同体的存在。虽然丰裕的物质生活也形塑出国家自豪感,但是这种过于遥远抽象的感知无法切实回应个体当下具体生活状况,更不能抵达内心深处。

由于集体主义话语在当代基本解构完毕,因此自我实现成为当仁不让的最高价值追求,一方面它让青年人自信迎接挑战;另一方面它也蕴藏着社会内部的各种焦虑不安。社会竞争性越强,个体也就越具备独立性,而越独立也就意味着越孤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大环境中,如果社会无法在生活或者工作环节为个体提供一定保障,同时又无法引导人们落实生命的意义,当竞争愈加残酷激烈时,加之缺乏来自共同体的安抚,个体的不安焦虑甚至失望绝望感就会更加凸显。而迷群类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小型共同体,这种圈层化的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稀释、缓冲了诸多负面情绪,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中介角色,为那些释放于网络空间、挣扎在现实社会底层感和无望感之中的青年们提供一种解释当下、超越底层的可能性,弱化了过度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碎片感,为个体和迷群中的他人建立一种真正的情感链接和社会支持,诚如鲁迅所言:无尽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相关^[8]。

(二)公益孵化器

在新媒体技术的助推下,引入现代社会科层制管理理念的迷群已经具备功能完善的现代组织架构,包括应援部门(为明星演唱会加油打气)、反黑部门(处理黑粉问题)、打投部门(即所谓打卡投票)、宣传部门、公益部门(以明星名义做慈善)等。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迷群发展出特定行为模式和价值评判标准,并在群体内部达成共识,在对内团结、对外排斥的共同实践中发展出高效组织运作能力。

如 2020 年初疫情暴发,为响应全民抗疫号召,众多粉丝打破平日“各自为政”的区隔,主动联合起来募集资金、购买急需物品并送达指定机构,全程皆由粉丝私人关系完成,且过程高效透明可监督,其强悍的执行效率甚至远超众多上市公司,得到主流社会一致肯定,因此也被称为“666 联盟”(即出色、高效之意)。

此外为了助力偶像事业发展、帮助其摆脱边缘化和娱乐化状态,迷群积极向主流社会靠拢,并在群体内部以“正能量、益起来”等进行自我规训以避免给偶像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他们也以偶像名义进行慈善募捐,如肖战粉丝仅仅在 2020 年参与并支持超过 256 项公益项目(不完全统计),公益总投入金额超过 9 810 万元。

虽然迷群类公益捐赠或慈善活动从本质而言不外乎是博取社会关注度的手段,但是这些活动给予青少年自我规训、团队合作的实践经历,活动的成功践行让他们体验到成就感、归属感等。这些有关自我实现的重要体验对青年人而言尤其珍贵,也是现有社会空间可能无法提供的。即便这些社会参与只是象征性和仪式性的,也会复苏他们潜意识中沉睡的社会性人格,从该角度而言迷群承载了青少年从纯粹个体到社会成员之间的中介。

三、迷群的突出乱象

饭圈所发展出的大规模组织动员能力如同双刃剑,这股巨大能量在催生出如公益捐赠类善行的同时,也由于资本诱导、群体非理性、粉丝自身素质欠缺等因素滋生出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甚至涉嫌违法的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一)网络暴力蔓延、侵权违法案件频出

出于对偶像的爱甚至是近乎盲目地崇拜,粉丝们不能容忍偶像一丝一毫被“亵渎”,即便是合理中肯的批评也不能接受。借助于即时便捷的通信技术迷群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分工明确的内部组织架构中存在专门维护偶像名誉的“扫黑”组,一旦发现所谓有损偶像声誉的人或事,粉丝们就开始群起而攻之,互撕谩骂、人肉搜索、污蔑诽谤等时常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也一触即发。事实上很多迷群冲突或纠纷案件缘由往往非常简单甚至微不足道,如仅仅因为双方喜爱的明星不同便恶语相向。

近来迷群粉丝冲突有据可查的如下:仅在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涉嫌名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中,与迷群冲突相关的案件

(即典型迷群侵权行为)占全部网络侵权案件的 11.63%(图 1),被告年龄在 21~25 岁的占 33%(见图 2),而且在作为被告的粉丝中在校大学生占据绝大多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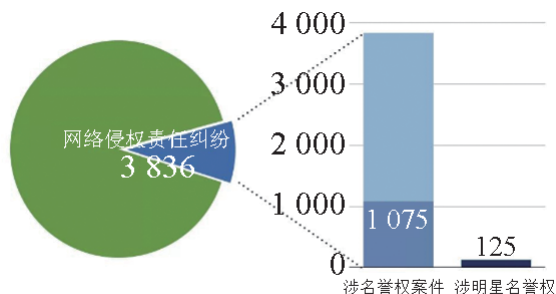


图 1 网络侵权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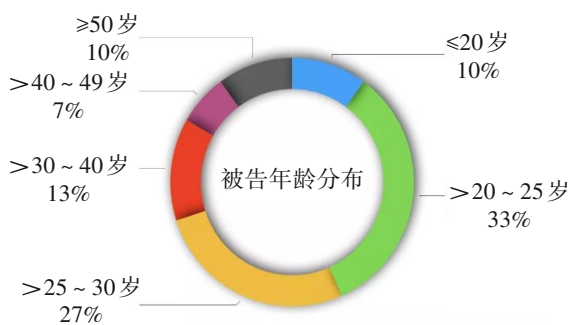


图 2 被告年龄分布

除上述侵权案件外,更有一些疯狂粉丝跟踪明星、在明星车底和酒店房间安装跟踪器或窃听器,对其进行监视。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此有过精彩阐述,“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10]。这些表述固然缺乏作为科学研究的严谨,但是勒庞从多年战地记者生涯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直觉中捕捉到了群体的狂热、非理性和极端,迷群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二)极端行为凸显、扰乱公共秩序

迷群是粉丝对偶像的喜爱而形成的自发组织,通过共同交流以及各种活动等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由此也滋生一种问题,即由于群体关注点和兴趣点都集中在自家偶像从而极易形成“信息茧房”,其他观点和信息往往会被选择性忽视^[11]。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研究也表明,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组织

内部,由于群体和谐需要小众化观点往往会遭到排斥,最终以群体抱团形式形成沉默的螺旋,各种群体极端非理性行为可能就此产生^[12]。当这种极端和宗教般的个人崇拜结合起来时,人性中最具战斗力的能量便会以群体形式激发出来,运用得好这种力量会追求真善美,给社会带来祥和喜悦,如同巴黎贵族在大革命中主动签字放弃自身贵族特权;反之则会给世界带来破坏和灾难,类似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事件在世界各地都曾经出现。

迷群对于上述两种极端趋势做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一端是如前文所述新冠疫情暴发时的粉丝公益捐赠事件。另一端则是明星肖战粉丝“A03”事件。有网友用肖战作为女主角名字在A03平台上(著名的同人文小众群体聚集地)发表一篇小说。众多粉丝认为此举侵犯了偶像名誉,因此开始持续举报小说及作者从而导致该网络平台被封。由于失去了A03这个精神栖息家园,大量用户开始与肖战粉丝发生激烈群体对抗。随着众多路人网友对肖战粉丝指责的不断增多,该事件发展至白热化状态以至于成为网络热搜事件,占据社会资源引发大众一致谴责,最终偶像工作室不得不发布道歉声明宣布此事告终。

2021年上半年一段倒牛奶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大量新鲜牛奶被拆封后直接倒入河道里^[13]。这种原本被记载在教科书中的、用以讽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事件竟然发生在当代中国,让人难以置信。事情缘由是某选秀节目要求粉丝购买牛奶以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而众多粉丝在购买大量、根本无法喝完的牛奶后不得不雇人将牛奶倒入河中。事情被曝光后引起了社会对迷群和资本的强烈批判。

(三)资本操控、诱导消费

迷群诸多乱象的确是粉丝所为,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好似提线木偶般被幕后黑手——资本所操纵权威媒体和官方机构对此强烈抨击并尝试采取专项整治行动^[14-15]。当前迷群的实质就是在资本操控下明星经纪公司及有关商家合谋展开的一场对粉丝的定向收割:首先利用平台推出选秀明星,制定规则后资本通过把部分表层权力(如打卡、投票等)等转移给粉丝以此唤起他们对明星的所谓“责任感”“成就感”,从而在情感上绑定粉丝,“养成系”偶像即就由此而来;随后利用综艺节目、影视剧及商业演出等收割流量。粉丝在经历了只能仰望和憧憬偶像到可利用金钱左右明星前途的转变后,由此滋生的权力支配欲望即自我赋权也会无生

长,种种群体极端行为的出现与资本诱导存在高度相关。

为加强管控、提高运作效率,迷群引入现实社会的科层制进行管理,内部等级严格、有着明确的阶层和规则。在迷群所谓“大粉”(即由于掌握很多和明星相关的信息从而在迷群中对普通粉丝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粉丝,通常这些大粉都是明星所在经纪公司的员工)的蛊惑下,粉丝纷纷掏出真金白银,选秀平台、明星、经纪公司以及上下游相关产业链赚得盆满钵满。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1400万集资,到2021年上半年的《青春有你3》《创造营2021》等选秀节目的动辄上亿集资,迷群的疯狂可略见一斑^[16]。

此外近年来迷群还盛行通过集巨资给偶像购买大幅广告牌、购买星星命名权等无意义操作,很多本来不打算花钱或者原计划只花少量的粉丝在经历上述被操控后不知不觉掏出了大量金钱。其中一些粉丝为集资应援竟决然踏入网络贷款黑洞或者超额花费父母血汗钱,宁愿让自己生活陷入困境也在所不惜。一些迷群还会制定集资目标,若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达成目标,迷群就要实行“惩罚”模式。总之在资本操控下迷群利用各种严格管理和传销式狂热氛围来掏空年轻人的口袋和脑袋。

四、迷群乱象治理对策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迷群种种乱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群体成长中诸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担忧。为治理迷群乱象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培养正确价值观、提高素养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阶段,为此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应分别扮演好各自角色,通过更高质量陪伴、关爱和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正确价值观,引导其树立远大理想、珍惜青春时光、努力提高自身学识、培养自己独立判断能力、正确看待偶像行为。其次可以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青少年人文修养和心理疏导,通过提高他们对影视歌曲等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来提高自身品质和欣赏水准,从而拒绝对明星的盲目追随。最后法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高同样不可忽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网络传媒素养教育分阶段融入青少年

教育中,我国也可以参考类似做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中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开设不同层次课程,培养青少年对信息的理解、甄别和传播能力,学会在追星过程中用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自身行为,坚守底线不去越界^[17]。

(二)加强关爱、增加现实吸引力

当前由于地理上的流动、社会身份的流动、婚姻关系的流动和政治上的流动等,熟人社会的强联系被陌生人社会的弱联系所取代,因此个体的孤独往往也不可避免^[18]。基于兴趣、爱好以及其他缘由聚集而成的迷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孤独感,在现实中受到伤害的人们也在趣缘群体中感受群体认同、温馨和归属感等。

不同于在工作和家庭事务忙碌的中年人,青少年可自由支配时间更多,也有充沛的精力去追求新奇事物。当他们面临繁重的学业压力、难以胜任的工作任务或者在恋爱交友中受挫时,内心处于焦虑迷茫、缺乏理解和关爱时,就容易沉浸在诸如迷群等亚文化群体中。因此家庭和学校需要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了解他们真实生活状况。学校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采取多种形式的线下和线上集体活动,让他们结识更多的身边朋友以降低迷群等网络交往的吸引力。

(三)嵌入偶像、借力平台

格兰诺维特认为在当下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不会过度内化社会主流价值观,信任是权衡是否嵌入某种社会关系、理性采取行为的重要网络机制^[19]。由于青少年对现实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漠视,因此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对其发生直接影响。传播学理论显示,情感投放程度和政治宣教效果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偶像成为对青少年群体构建意识形态权威的天然最佳中介人选;同时明星也渴求借助官方媒体的权威阵地来传播自身,因此可以倾斜舞台资源、选择正面积极的偶像,代言特殊部门或特殊群体、事件等,严肃刻板的政治理念经由偶像演绎后往往呈现出高度亲和力和更高可信度,通常会吸引大量粉丝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青少年群体

的政治宣教。

为助力偶像发展近年来众多粉丝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在B站、微博、豆瓣等网络平台的发帖、留言及弹幕中等都可充分窥见。可充分利用这些青少年高度活跃的平台,在保证政治权威性的前提下,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行合适话语呈现,填充迷群集体仪式内容,激起具有最广泛情感共鸣的网络符号,引导他们打破僵化的圈层思维,进而拥抱并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热情忠诚、未来可期的追梦人。

(四)强化资本监管、处置不法行为

迷群乱象根源在于粉丝经济中相关产业链上资本对利润的贪婪追逐、诱导青少年无底线追星,从而出现各种非理性应援、不当消费等。因此对资本不论是明星经纪公司还是媒介平台的管控都至关重要,在他们从迷群中获益的同时,也理应切实履行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首先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相关立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资本权力的合理使用。其次要监督平台方和经纪公司完善管理责任和审核责任,如健全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规则、规范和监控粉丝群体的网络行为。通过进一步对平台和相关商家施压来促使其真正履行自身责任、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第三相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网络平台、商家和粉丝的违法监督,定期排查、查找隐患、重点整治,如严格查处迷群中的职业黑粉和恶意营销等,深挖有关炫富、沉迷享乐等不良价值观的内容。

对于违法案件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事件,要依法及时处理或采取事后追责,同时向社会曝光接受社会监督。最后由于迷群已在内部实现大规模、高效率的组织动员活动,共同体的认同和边界被反复强化,在认识和实践层面已经达成对内团结、对外排斥的共识,因此必须防范其在特定社会议题演化过程中呈现极端化趋势,发展成为冲击现有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对此相关部门需保持警惕。

注释:

- ① 饭圈女孩出征事件:2019年香港乱局之际,众多明星发声高喊“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一些示威者对明星进行言语辱骂,甚至计划进行暴力攻击。众多粉丝在气愤之余决定联合“出征”各大海外社交平台,“血战讨伐”示威者账号。

参考文献:

- [1] 安娜·佛洛依德.自我与防御机制[M].吴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8-97.
[2] 岳晓东.追星与粉丝:揭秘偶像崇拜中的心理效应[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35-143.

- [3] 中国网. 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EB/OL].(2022-02-28)[2022-07-26]. http://news.china.com.cn/2022-02/28/content_78075728.html.
- [4] 央广网. 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中国人为啥结婚越来越晚[EB/OL].(2022-06-24)[2022-07-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473398440055750&wfr=spider&for=pc>.
- [5] 唐纳德·温尼科特. 游戏与现实[M]. 卢林,汤海鹏,译.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9:164-177.
- [6] 裴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张巍卓,译. 北京:商务印刷馆,2020:201-209.
- [7] 付宇,桂勇. 当丰裕一代遭遇资产社会——解读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J]. 文化纵横,2022(158):18-28
- [8] 陶庆梅. 当代青年的新个人主义——从《哪吒之魔童降世》谈起[J]. 文化纵横,2019(142):25-32.
- [9] 新京报. 北京互联网法院:网络侵害名誉权案逾1成涉粉丝侵权艺人[EB/OL].(2019-12-20)[2022-07-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426863358844478&wfr=spider&for=pc>.
- [10]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84-92.
- [11] 凯斯·R.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9-147.
- [12] 斯蒂芬·P·罗宾斯,蒂莫西·贾奇. 组织行为学:第18版[M]. 孙健敏,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178-185.
- [13] 央视新闻. 主播说联播:“倒奶事件”让人心痛,刚强:遏制这类浪费,法律要有足够的办法[EB/OL].(2021-05-06)[2022-08-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933980491364913&wfr=spider&for=pc>.
- [14] 新京报. 中纪委发文谈“饭圈”:资本参与每一环节,对粉丝钱袋子反复收割[EB/OL].(2021-08-05)[2022-08-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243988536255179&wfr=spider&for=pc>.
- [15] 中国青年报. “饭圈”乱象背后,资本在推波助澜[EB/OL].(2021-08-27)[2022-08-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240277561142313&wfr=spider&for=pc>.
- [16] 新华网. 偶像选秀综艺乱象调查:灰色“集资”泛滥,资金该由谁管理?[EB/OL].(2021-03-29)[2022-08-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527574899745100&wfr=spider&for=pc>.
- [17] 陈志勇. 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教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126-134.
- [18]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21:207-213.
- [19] 马克·格兰诺维特. 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M]. 王水雄,罗家德,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21-230.

(上接第40页)

参考文献:

- [1] 温在波.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多元探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8):11-1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卢岚.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出场逻辑与研究理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0(5):17-22.
- [5] 刘丙利,胡钦晓. 论智慧教育的空间逻辑[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34(3):40-47.
- [6] 卢岚. 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转向的缘起、动力机制与价值勘定[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4):105-118.
- [7] 徐曼,冯小桐.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5(3):80-84.
- [8] 张珩. 空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探索[J]. 江苏高教,2020(12):136-139.
- [9] 邓纯余. 社会空间理论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 学术论坛,2013,36(4):75-78.
- [10]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
- [11] 黄传慧. 高校思政课,话语有讲究[N]. 光明日报,2019-06-18(4).